

陳與義集校箋

上



〔宋〕陳與義撰
白敦仁校箋

陳與義集校箋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曹光甫
封面題簽 楊家駒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陳與義集校箋

(全二冊)

〔宋〕陳與義 撰

白敦仁 校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8 印張 35.2 字數 617,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 -5325-0737-8

·I·439 定價: (平裝) 16.90 元

前言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生於北宋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卒於南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終年四十九歲。

與義二十四歲以太學上舍釋褐，被分到開德府（治今河南濮陽）做了幾年教授，回東京後又先後做了兩任教官。由於他的墨梅詩受到徽宗趙佶的賞識，由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很快擢升到符寶郎。後因宰相王黼得罪受到牽連，謫監陳留酒稅。靖康之難，他從陳留避地南奔，開始了五年的多的流亡生活，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於紹興元年最後到達當時的行在所會稽。以後，歷任兵部員外郎、起居郎、中書舍人、吏部和禮部侍郎，出知湖州，入為給事中、翰林學士等職。在政治上，他積極支持主戰派張浚。張浚秉政，與義為參知政事。不到一年，張浚罷相，與義亦引疾求去，不久病死在湖州。他的生平事跡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陳與義傳和張嶠紫微集卷三十五陳公資政墓誌銘。

與義生活在北宋交替時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他的一生，經歷了北宋滅亡、南宋

偏安，方臘起義，鍾相、楊么起義；經歷了崇寧、大觀以來中央王朝黨派傾軋的激烈鬭爭。特別是靖康以來的戰亂使他接觸到廣闊的現實生活，民族的苦難，國家的破敗和屈辱，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艱辛，遍及南北的廣大人民抗金救亡的呼聲，這一切，激勵着詩人，他終於唱出了充滿愛國激情的戰歌：

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顓頊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二）。

這一類公然宣稱要上馬殺敵的雄壯歌聲，反映了人民的意願，和同時代另一位詩人曾幾《茶山集》中的一些戰鬭詩篇，同樣可以看作偉大愛國詩人陸游的先河。

自從方回論詩，把陳與義和杜甫、黃庭堅、陳師道拉在一起，硬派做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三），人們也就習慣於把陳與義算作江西詩派詩人，這實際上是一種誤會。

我們知道，陳與義早在開禧任教官時就和呂本中的叔父兼詩友呂知止一起寫詩，他和呂本中本人也不止一次在一起互相唱酬（四）。可是，呂本中論詩，從來沒有提到過陳與義，更沒有把他的名字列入江西宗派圖。一些和與義接近或稍後一點的人也只說他「上下陶、謝、韋、柳」（五），或者把他和崔鵬相提並論（六），而不算他做江西派。陳善《捫蝨新話》上集卷四云：「世以簡齋詩為新體。」也沒有提江西。嚴羽《滄浪詩話》論詩體則列有「陳簡齋體」一項，注云：「亦江西之派而小異。」這條注文很值得研究。

首先來看看所謂「亦江西之派」。我們知道，當陳與義作為一個青年詩人登上詩壇時，正是黃、陳詩風風靡一世的時候，要他一點也不受影響是不能想像的。試把他的鄧州西軒書事十首和黃庭堅的病

起荆江亭卽事十首這兩組七言絕句拿來比較。則其所受黃詩的影響是再顯然不過的。此外，與義論詩十分推重陳師道，把陳詩看做是「不可不讀者」(六)，劉辰翁也認為與義的詩是「以後山體用後山」(七)。嚴氏所謂「亦江西之派」指的不外就是這些內容。只要想一想陸游、楊萬里、姜夔這些詩人的創作生活的早期都會受過江西派的影响，則陳與義的「亦江西」是不足為怪的。這裏重要得多的倒是嚴氏說的後半句「而小異」三字，正是這點「小異」，才足以說明陳簡齋之為陳簡齋。

與義少時嘗學詩於崔鷗(八)，他後來經常提到崔鷗給他的兩點啓示：一是「忌俗」，二是「不可有用事」(九)。這兩點，實際上是說對於當時流行的江西派詩風，必須揚長避短。「忌俗」本來是江西派的主張，黃庭堅就說過「寧用字不工，不可語俗」，陳師道也主張「寧僻毋俗」。這種主張，就其唾棄凡庸、不主故常、提倡詩歌創作中的獨創精神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葛勝仲在評論與義詩時就指出，他的詩「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一〇)。這正是「忌俗」精神的體現。所謂「不可有意於用事」，則顯然是針對江西派所提倡的「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無一字無來歷」之類的「以學為詩」的不良傾向提出的。與義的詩歌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崔鷗給他的這一啓示。他嘗舉「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休日早起)(二語以示人，認為這是平生最得意的句子；而龔相、朱松也特意拈出這兩句詩來揣摩簡齋詩法(一一)。這種衝口直致、淺語入妙的詩和江西派「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一二)的作風何止是「小異」？而這恰恰是陳與義努力追求的詩境。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敘述自己和與義論

詩，曾舉出與義貞牟書事中的「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蒼山雨中高，綠草溪上豐」幾句大加贊揚^{〔三〕}。這也是鍾嶸所謂「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好詩，和江西派末流的「拘攣補衲」也是大相逕庭的。

陳與義不像那些「預此宗流，便稱才子」（鍾嶸語）的人，對於詩，他有自己的見解和風格。劉克莊說：「元祐以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五〕}劉辰翁說：「惟陳簡齋以後，山體用後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六〕}則後山比簡齋刻削，尙似矜持未盡去也。^{〔七〕}這些評論，着重指出與義詩能在蘇、黃、陳諸大家影響之外自開戶牖，自辟畦徑，發展自己獨特的詩歌風格。這一點，與義自己是清楚地意識到了的，他說：「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少陵之涯涘。」^{〔八〕}爲了擺脫蘇、黃的影響，他廣泛地向前代詩人學習。他不僅提倡學建安，學六朝^{〔九〕}，而且有取於晚唐的苦吟；然其心目中的最高標準則始終是杜甫。他認爲晚唐詩人「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他主張「取諸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之中」^{〔一〇〕}。如果說與義前期詩歌主要是從藝術技巧方面去學習杜甫，那麼，經過靖康之難這個天崩地塌的大變動，他「在流離顛沛之中，纔深切體會出杜甫詩裏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同感」，從而認識到杜甫是自己「患難中的知心伴侶」；「要抒寫家國之恨，就常常自然效法杜甫這類悲壯蒼涼的作

品」。[二]與義靖康元年避地南奔的第一首詩發商水道中說：「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詩又說：「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他對杜甫有了更深的領會，他的詩進了一步，有了雄闊慷慨的風格。今集中五律如發商水道中、至葉城、聞王道濟陷虜、渡江、劉大資挽詞二首等，七律如登岳陽樓二首、巴丘書事、再登岳陽樓感慨賦詩、除夜、次韻尹潛感懷、傷春等，五古如次舞陽、次南陽、北征、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均陽舟中夜賦等，都寫得蒼涼悲壯，憂憤深廣；特別是七律，沉鬱頓挫，頗能逼近杜甫，而又不失與義個人的特色。與義的五言排律和七言古詩寫得不多，但五言排律如道中書事、感事，七古如居夷行、雷雨行，都顯然帶着學杜的色彩，但力量較弱，不能達到杜甫那種蒼莽橫絕、波瀾壯闊的境界。總之，在宋代詩人學杜中，陳與義是較有成績的一個，因為他能够做到骨肉停勻。

與義詩除了學習杜甫，集中的許多詩篇，就其語言風格而論，往往接近於韋應物、柳宗元。特別是一些五言古詩，格澹而奇，趣新而妙，在宋詩中是別具特色的。這大約和他早年受到崔鷗的影響有關。崔鷗有婆娑集三十卷，今已無傳，但從他的一些佚詩看，其造詣是較高的。宋史崔鷗傳稱他「清峭雄深，有法度」。晁公武也稱他「清婉數腴，有唐人風」。劉克莊云：「詩至於深微，極玄絕妙矣。」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能之。」[三]這就透露了此中的消息。張嶠稱陳與義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徐閑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近人馮煦也說與義詩具有「一種蕭寥逋峭之致，譬

之繚澗邃壑，遠絕塵瑱」(三)。這些評論，大約都是就其五言古體詩說的。集中如宣和五年在汴京寫的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綠陰生畫靜賦詩得靜字一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明代的評論家一般鄙薄宋詩，但像與義的「雲間落日淡，山下東風寒」，「生身後聖哲，隨俗了悲歡」(江行晚興)；「微陰拱衆木，靜夜聞孤泉」(今夕)；「殘暉度平野，列岫圍青春」(隕色)。這些詩句，在當時也被譽爲是「膾炙藝林」的(三)。大抵與義五古重意境，善白描，每每從閑淡處取神，這和江西派詩風也是各異其趣的。

陳與義的七言絕句也很有自己的特色。除墨梅五首乃其成名之作，鄧州西軒書事十首等學杜、學黃，但又「不爲己甚」者外(三)，張邦基則稱其「中庭淡月照三更」(秋夜)，以爲「不減王荊公」(極爲清婉)之作(三)；葉賓舉其「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春日)，以爲「靜中置心，真與見聞無毫末隔礙，始得此妙」(三)；王士禎對與義頗有微詞，但也稱引「獨凭危堞望蒼梧」(城上晚思)，以爲「可追踪唐賢」(三)；潘德輿則舉出「卷地風拋市井聲」(清明)，以爲「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明珠美玉，千人皆見」(三)。試看下面這首中牟道中：

楊柳招人不得媒，蜻蜓近馬忽相猜。如何得與涼風約，不共塵沙一并來！

這是宣和四年夏秋之間，與義丁母憂服除，自洛歸京道中之作。寄興深微，把當時中央王朝黨派傾軋的黑暗現實，詩人潔身自好、防嫌畏禍的矛盾心情，曲折地表現了出來；而詩歌攝取的生活形象又是那麼清新、真切，可以感覺，發人深省。

陳與義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有影響的詩人。早在南宋時候，朱熹就稱他「詞翰絕倫」〔三〕。他的父親朱松、叔父朱棣，以及龔頤正的父親龔相，與義的表侄張嶠都是陳與義詩風影響下的詩人〔四〕。陸游集中也有追和陳去非韻的詩〔五〕。連道旁逆旅偶然出現一首無名人的題詩，人們也一見而知其爲「蓋學陳簡齋詩法者」〔六〕。到了宋末元初，由於劉辰翁、方回等人的推崇和提倡，學簡齋詩的越來越多。程文海《雪樓集》卷十五「自劉會孟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爲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餘習時有存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名叫陳從古的詩人竟然次韻和了簡齋集中全部五百多首詩〔七〕。這除了東坡和陶，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和清真詞，在文學史上也是很少見的。到了明代，「那些推崇盛唐詩的明代批評家對『蘇門』和江西派不甚許可，而看陳與義倒還覺得順眼」〔八〕。清代如厲鶚、陳沆都是專學簡齋詩的。清末學宋詩之風大行，受他影響的人就更多了〔九〕。而他的「微波喜搖人，小立竚其定」，寄興深微，七百多年後，還在人們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十〕。

陳與義除了寫詩，在他創作的後期，還寫了數量不多但質量却很高的詞，收在現存無住詞中的僅僅只有十八首，曾慥曾將其全部選入《樂府雅詞》。這些詞，黃昇稱之爲「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十一〕，王灼稱他「佳處一如其詩」〔十二〕。元好問說：「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想；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十三〕如果說，陳與義的某些愛國詩篇開了陸游詩的先河，那麼，無住詞在某種意義上說也開了稼

軒詞的先河。

最先給陳與義集作注的是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的胡舜仲。胡氏的生平事迹不詳，樓鑰稱他「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大約是一位名位較低的士人。這個注本和其它幾種宋人注宋詩相比雖非上選，但人們對它的評價還是比較好的。樓鑰說它「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三〕}，阮元也說「凡集中所與往還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固讀與義集者所不能廢也」^{〔四〕}。這些評論，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蓋胡氏去簡齋年代不遠，耳目相接，一些材料可能得自故老相傳，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彌可珍貴。可是，也正因為時代相隔太近，一些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東西，在當時尚未流傳，胡氏反而不能見到（如葛勝仲的丹陽集之類）。這就使胡注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失誤和漏略，亟有待於後人的補正。

本書就是為補正胡氏舊注而作的。總的說來，在箋語部分用力尤多，其要點在於人、地、時、事的徵實，意在為治簡齋詩者提供一些更具體的背景材料。例如開卷第一首詩中的文驥、劉宣叔、張景方以及全書中許多較偏僻的歷史人物如王道濟、夏致宏、葉天經等等，胡氏或未注，或語焉不詳。本書則詳加考索，或為讀者提供一些進一步探討的線索。毫無疑問，弄清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及其友朋往來踪跡，對於理解作品是十分必要的。例如，不了解義建炎二年曾有一段權攝知均州的經歷及其與席益的先後任關係^{〔五〕}，則江行野宿寄大光（卷二十四）詩中「平生正出元子下」云云的用事精切，就不

能得到說明；而均陽官舍、同通老用淵明韻（卷十九）諸詩也就難於索解。不了解與義和葛勝仲的親密關係，則與義在汝州三年的生活和創作，他後來謫監陳留酒稅的原因，特別是外集中的大量詩篇就很難解釋清楚。本書對與義友朋唱酬之作，如葛勝仲、呂本中、張元幹、張嶠諸人的作品亦盡力加以搜求，各箋入有關詩篇之後，意在更有力地顯示出當時創作的具體環境和與義詩的獨創風格。其無具體詩篇可附者，則編入書末附錄四：制詔酬贈哀祭卷內，以爲讀者知人論世之一助。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陳從古和涪溪詩一首，是直接錄自崖壁，七百多年來還是第一次得到記錄，也是他和簡齋集五百多首詩中保留下來的唯一一首詩；厲鶚宋詩紀事也未提到這個詩人。

與義詩有看似易懂，但如果不弄清其具體歷史背景實難真正讀懂，甚至產生誤解的。如書懷示友（卷三）詩之「試數門前客，終歲幾覆車」云云，本書根據靖康要錄、三朝北盟會編諸書所載史實，說明詩人「門前覆車」之歎決非無病之呻吟。又如若拙弟言汝州可居（卷六）詩，則詳細考查了李彥查田之病民以及葛勝仲與與義兄弟的特殊關係，從而較具體地闡明了詩人陳與義的政治態度。它如聞王道濟陷虜（卷十九）、避貴寇入洞庭（卷二十一）、傷春（卷二十六）諸詩的歷史背景均有非注不可而胡氏未注或注而不詳的，則廣引羣書，加以必要的補充。其有由於不了解寫作的時代背景而造成對詩意的誤解的，如秋日客思（卷十六）之「諸公共得何侯力，遠客新抄陸氏方」二語，則確有所據地對方回、紀昀的誤解提出不同看法。又襄邑道中（卷四）一詩的編年問題，是理解與義早期詩歌的關鍵，胡氏年譜將此詩

編在政和七年，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又書懷示友詩第七首，胡氏牽涉「北虜背盟」事，亦與時代、詩旨不合。凡此皆就鄙見所及，一一加以釐正。

胡氏於詩中典故、成語出處的箋注用力尤勤，創獲亦多，本書的注文部分亦多加採用，但也進行了一番爬梳整理工作，包括補題篇卷，增注缺略，刪汰繁瑣，訂正失誤等。對於胡注所引諸書，絕大多數查對了原文。經過整理，對胡氏原文頗有更改。因此，除了一些必要的地方，一般不題「胡注」云云。非敢掠美，實有所不得已者。鑒於簡齋集刻本錯訛，注文尤甚，實有不勝其校者。今既不題「胡注」，遇有錯訛，則根據原書或有關資料直接加以訂正，省去對注文另出校語。如中秋不見月（卷十）詩注文引宣室志，頗多錯訛，則據類說、太平廣記所引加以訂正。有些地方，對於今天讀者是非注不可的，如同周紹祖分茶（卷六）的「分茶」二字胡氏無注，則加以補注。至於胡注本身的顯然失誤，如葛工部寫經（卷七）詩的「葛工部」，胡氏誤注為葛勝仲，則據丹陽集、歸愚集有關資料改為勝仲之兄和仲。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卷六）詩「政須青山映白髮」乃用蘇軾子由復至齊安以詩送之「早晚青山映華髮」，胡注誤引作柳子厚詩。和淵明止酒（卷八）詩「奈何劉伶婦，苦語見料理」的「料理」，胡注引桓沖云云，剛好把意思弄反了。此條錢鍾書先生已有駁正，則據管錐編加以訂正。按錢氏管錐編中論及簡齋詩各條極多精辟之見，又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對與義詩中某些詞語的疏解亦頗多勝義，本書注文部分亦多所採用。

又，劉須溪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本，對胡注進行了刪節，又加了一些新注。新注有的注明「增注」，有的沒有。這個「增注」未知出於何人之手。據夜賦寄友詩增注有「須溪先生詩中用米嘉，亦此例」云云，可以肯定不是劉辰翁本人手筆，很有可能是他的門人弟子所爲。增注中常常引「中齋云」，按中齋乃鄧剡之號。剡字光薦，號中齋，廬陵人。景定三年進士，祥興時歷官禮部侍郎。剡乃文天祥客，和劉辰翁是同鄉，常在一起唱酬，宋亡以義行者。有中齋集，今佚。厲鶚宋詩紀事卷七十九載其詩八首，唐圭璋全宋詞輯其詞一卷，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九引遂昌雜錄載其鷓鴣詞及文丞相畫像贊各一首。增注或補充胡注，或訂其訛誤，或許品詩詞，頗有一定的見地。本書亦頗加採用。這樣，本書的注文部分實具有集注的性質。

外集中的詩歷來無注本，今則新爲之注。這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例如，開卷第一首詩中「易元光」的出處，我是求索多年不得，最後還是在我的朋友謝宇衡同志的幫助下纔找到的。這使我感到，即使要達到胡注的水平也大非易事。外集詩中偶有雙行夾注，從內容、語氣看有部分是與義自注，有部分別注者未詳，今一併沿用。

陳與義集的最早刻本是紹興十二年壬戌毘陵周葵於吳興所刻，葛勝仲爲之序。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宋史卷三百八十五有傳。宣和四、五年間，與義任太學博士，葵「時爲諸生，專取先生之文以爲準的」（本集卷十七無題詩胡注）。與義參知政事，嘗用葵爲湖南提刑未就；又嘗密薦之於朝。葵

後除殿中侍御史，以忤秦檜落職，起知湖州。至是取簡齋詩，離爲若干卷（按周刻十卷，見劉須溪評本葛工部寫經詩增注），委僚屬讐校而命工刻版（書）。時距與義之歿甫四年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云：「周葵得其家所藏五百餘篇刊行之，號曰簡齋集。」是周葵刻本所據爲陳氏家藏稿。沈曾植寐叟題跋卷一云：「墨林快事：『宋刻陳簡齋集是公自書上木，醇古丰圓，出自黃庭。』然則周葵所刻非但爲公自訂本，且爲自書本也。」今按墨林快事十二卷，明安世鳳撰，北京圖書館有抄本六冊，王蘭泉舊藏。沈氏所引見原書卷七。然考安氏原文有「詩則又集中最合作者」及「況於集之大全，恨不及請益」等語，則安氏所見非全集，沈氏以爲卽周葵刻本，恐不足據（書）。自胡箋本行而周刻遂亡，不識天壤間尙有此紹興刻本否。

與義詩宋代刻本除周刻紹興本及胡注紹熙本二種外，據劉須溪評本增注所引尙有武岡本、閩本二種。這兩個本子未見諸家著錄，賴增注保留了一些佚文，彌足珍貴。例如胡注本卷二十六無次周漕示族人韻至別諸周七首，翟、黃、蔣刻皆同；丁氏八千卷樓藏舊抄本，聚珍本有之，查增注，始知出於武岡本所附拾遺。又別諸周一首，丁抄、聚珍本均誤「周」作「州」，此本不誤。又與義建炎四年避地邵陽依紫陽周氏以居，拙著陳與義年譜疑周氏蓋與義妻族，今此本所引古汴姜桐跋語果有「紫陽周氏甥館」之語，給鄙說提供了直接證據，這些都是極可寶貴的。

我此次校勘陳與義集採用四部叢刊影印翟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及四部叢刊影

印元抄本簡齋詩外集作爲工作底本（簡稱原本）。因爲四部叢刊流行較廣，其據以影印的底本又都是現存與義集最早的版本。叢刊所據的兩種底本今並藏北京圖書館，已取與影印本對校。此外，還校了以下各本：

一、黃丕烈藏宋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卷十至三十係抄配，現藏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題作元刻本。（簡稱黃本）

二、蔣國榜影刻宋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簡齋詩外集一卷。其外集則據瞿氏所藏元抄本影刻。（簡稱蔣本。又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據蔣本校刊，錯訛較多，且多臆改，今不以入校）以上二本與瞿本同出一源，但亦小有異同。

三、李盛鐸藏日本翻刻明嘉靖朝鮮本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今據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版點校本陳與義集轉引（簡稱李氏藏本）。由於未見原書，凡所稱引，皆標明「點校本引」，以示不敢掠美；且冀能得原書一覆校也。

四、丁氏八千卷樓藏舊抄本簡齋詩集十五卷，現藏北京圖書館，書面題「八千卷樓支架」。（簡稱丁抄）

五、武英殿聚珍本簡齋詩集十六卷。（簡稱聚珍本。馮校稱庫本，同）

六、宣秋館本簡齋詩外集一卷（簡稱宣秋館本），北京圖書館藏。

七、汲古閣六十名家詞本無住詞一卷。（簡稱毛本）

八、朱祖謀刻彊村叢書本無住詞一卷。

此外，還參校了以下諸書：

- 一、萬曆刻本潘是仁編宋元詩四十二種，北京圖書館藏。（簡稱潘本）
- 二、宋詩鈔一百六卷，通行本。
- 三、瀛奎律髓四十九卷，道光間紀昀刊誤本。
- 四、永樂大典二百冊，影印本。所收乃胡注本。
- 五、蔡正孫詩林廣記十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新校弘治本。
- 六、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農業出版社影印日本藏宋刻殘本配舊抄本。

此外，還校了幾種與義手書詩稿：

- 一、故宮博物院藏與義手書水仙詩墨迹，故宮週刊影印。
- 二、明嘉靖三十七年長洲文氏停雲館帖刊陳簡齋詩卷。
- 三、清鎮洋畢氏經訓堂帖刊簡齋詩卷。

所據舊校，則有：

- 一、黃丕烈校本。北京圖書館藏黃氏藏本有校語多條。（簡稱黃校）
- 二、莫友芝校本。劉翰怡舊藏，原書未見，據馮煦校本轉引。（簡稱莫校）